

城市社会凝聚的测量： 深圳社会质量调查数据与分析*

武艳华 黄云凌 徐延辉

【摘要】 本文立足于沃尔夫冈·贝克等人的社会质量理论，借鉴和调整了艾伦·沃克的指标体系，用以探讨经济和社会转型期我国城市社会凝聚状况，并据此评估转型期的社会质量。研究表明：我国城市社会凝聚总体水平不高，且存在明显的阶层、城乡和代际差异。低收入阶层、农村人口和年轻人的社会资本、社会参与、利他意愿及社区认同普遍偏低。因此，当前政府应调整资源分配机制，促进社会成员的社会参与，提升社会凝聚。

【关键词】 社会质量 社会凝聚 社会信任

【中图分类号】 C9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114X (2013) 02-0210-10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严重的失业和贫困问题，让新自由主义思想备受质疑，并引发了界对发展问题的大讨论。20世纪90年代，学界逐渐形成一种新的发展观，强调各国家和地区应该从纯粹的经济转向更为综合的社会发展，寻求社会质量（Social Quality）的全面提升。社会质量作为一种新的发展视角，强调以人为本，以经济社会的均衡发展为重点，注重参与赋权和良好社会关系的构建，恰好为我国政策调控与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标准和参照。而社会凝聚作为社会质量的四大要素之一，更是衡量社会稳定和团结的重要指标。

一、问题的提出

社会质量理论源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欧洲举办的一系列科学和政策导向的会议，是对欧洲大陆新自由主义经济趋势的一种回应。作为一个指涉人们日常生活质量的综合性视角，社会质量理论为决策者和民众提供了一个理解社会变迁及评估国家政策的有效工具^①。根据欧洲学者的界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社会质量视角下的社会建设研究”（项目号：11ASH001）及厦门大学基础创新科研基金项目“厦门岛内外一体化进程中公共服务体制机制创新研究”（项目号：0220ZK20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定,“社会质量是指民众在提升他们的福祉和个人潜能的条件下,能够参与社区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生活的程度”^②。一般来说,社会质量内涵包括:社会经济安全、社会凝聚、社会融合、社会赋权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相互结合,共同决定社会质量的发展方向。作为其组成部分之一的社会凝聚,近些年来备受关注。

关于社会凝聚,国际理论界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概念和指标体系。社会凝聚最初源于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的研究,他将社会凝聚当作一个社会的秩序特征,认为共享价值与社会分工是社会团结与秩序的基础。随后,一些社会心理学家从个体、群体及环境角度对社会凝聚进行了探讨,他们认为:当群体层面的环境(如:社会网络等)导致积极的个体态度与行为以及当个体成员之间的互动足以维持这种群体环境时,群体凝聚力就产生了^③。费斯汀格(Festinger,1950)认为社会凝聚就是个体的态度与行为,是个体成员保持群体身份、成员资格的力量集合^④。加拿大社会理论家詹逊将凝聚型社会描述为各个群体都能感受到“归属感、参与、融入、认同及合法性”的社会^⑤。他将社会凝聚分为以下几个维度:社会资本、共同价值与文化、社会秩序、社会团结及归属感等。在陈等人的理论中,社会凝聚被定义为:一系列关于社会成员间横向与纵向互动的事件集合,主要由态度和规范构成,包括信任、归属感、参与和互惠意愿及相关行为^⑥。

如今,随着世界发展模式的转型和社会政策浪潮的兴起,社会凝聚作为一个政策视角与实践工具,逐渐引起各国家和地区联盟的关注。国家层面上,加拿大政府和英国自由党主要关注社会凝聚相关问题,尤其是移民的社会融入。加拿大社会发展委员会在针对移民的研究中,将社会凝聚定义为基于信任、希望与互惠基础上的,社会培育公共价值、共享挑战及平等机会的过程^⑦。地区联盟层面上,欧洲委员会主张将欧盟的经济社会凝聚作为主要的政策目标,并从更宽泛的角度将凝聚分为:民主凝聚、社会凝聚及文化凝聚。欧盟认为社会凝聚是建立在社会团结基础上的,社会团结则被包含在普遍社会保护、应对市场失灵机制及对话系统里^⑧。相对于加拿大研究中对共享公民权的关注,欧洲更加强调社会凝聚在应对经济社会排斥及权利缺失(rights deficit)上的作用。

可见,社会凝聚本质上是一个与社会信任及社会资本相关的问题,旨在考察一个社会的社会关系在何种程度上能保有整体性和维系基本价值规范,以整合个人、群体和社区,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排斥和分化。现阶段,依托社会质量理论来考察社会凝聚的实证研究不多,因此,本文以艾伦·沃克(Alan Walker)社会凝聚指标为基础,对深圳社区社会凝聚情况进行实证分析,以期对我国城市社会质量形成初步了解,为后期政策实践提供有益思考。

二、社会凝聚的解释框架与指标体系说明

出于本土研究和政策实践的考虑,本文参照艾伦·沃克(Alan Walker)社会凝聚的指标体系,评估深圳社会凝聚状况。在艾伦·沃克的理论中,社会凝聚是由信任、价值规范、社会网络和身份认同四个维度,一般信任、特殊信任、利他主义、宽容、社会连带、社会网络、国家或地域认同、人际关系认同八个子项目,十八个指标构成^⑨。文章根据中国实际情况,对具体指标进行了修正,最终社会凝聚指标体系见表1。

表1 社会凝聚的衡量指标

项目	子项目	指标
信任	一般信任	对“大多数人是否都值得信任”说法的认同
	特殊信任	人际信任: 对于家人、朋友、邻居、陌生人、不同信仰者、外国人、医生、雇主、老师、记者的信任 制度信任: 对于宗教团体、军队、新闻媒体、公安机关、司法机关、行政机关、立法机关、非营利组织、大公司、教育科研机构、银行、医疗机构的信任
价值规范	利他主义	是否愿意贡献收入的10%支持失业者或贫困者的项目 是否可以为公众利益而牺牲个人的自由和快乐
	宽容	对于移民、多元化、文化差异的认同 对于他人的行为和生活方式的宽容
	社会连带	认为贫困的原因在于个人还是社会 个体通过努力能否达到更高社会或经济地位
社会网络	社会网络	作为政治的、自愿组织的、慈善组织的或俱乐部的成员
		是否得到来自于家庭成员、邻里的帮助
		与朋友、同事交往的频率
身份认同	国家或者区域、地方的认同感	作为一个公民的骄傲感(作为社区成员的认同)
		国家或者区域、地方的认同感(对世界成员、亚洲一员、国家一员、城市一员的认同)

资料来源: Walker, A. (et al), 2003, Indicators of Social Quality of the European Scientific Network,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Quality, Vol. 5 (1&2): 19.

三、社会凝聚的分析与测量

(一) 调查的相关介绍

本研究的调查对象为深圳市民,即在深圳工作或生活一年以上的常住人口。为使调查对象能够覆盖深圳各个社会阶层,保证研究的科学性,我们采取分层抽样法选取调查对象。第一阶段,依据产业类型及人口构成等特点,从深圳选取罗湖区、福田区、南山区、宝安区和龙岗区等五个异质性较强的行政区。第二阶段,在五个行政区里,选取典型社区(如老城区、城中村、商品住宅区、单位社区、保障房社区等)。最后,依社区居民名单,按照PPS法,入户抽样。调查累计发放问卷1300份,回收1149份,其中有效问卷1010份,有效率为87.9%,符合社会调查的基本要求。

社会凝聚表现为各个群体间的团结与融合,因此,除了描述分析外,文章还利用年龄、收入和来源地等变量进行方差分析和卡方分析,比较不同群体在社会凝聚上的差异。年龄上,文章以“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为分水岭,将调查对象分为青年组(1978年之后)、中年组(1966年-1977年)和老年组(1965年之前)。收入上,调查对象被划分为高中低三个收入组。高收入组为月薪4810元以上,对应于广东省城镇居民最高20%收入组的月人均可支配收入。低收入组为2242元以下,即低于广东省城镇居民月人均可支配收入。而中等收入群体位于两者之

间。来源地上，将调查对象分为农村和城市人口。通过这种划分，样本特征如下：年龄上，青年组占 54.4%，中年组占 29.3%，老年组占 16.2%，调查对象中的青年组与全国人口统计数据中的百分比相似，但老年组比例偏低。收入上，低收入组占 42.3%，中等收入组占 35.0%，高收入组占 22.7%，可见调查对象的阶层结构呈“金字塔”型。来源地上，城市人口占 64.7%，农村人口占 35.3%。

（二）信任

信任被看作是构成社会凝聚和社会资本的重要元素，与社会结构和文化规范紧密相关。它能够通过集体责任和连带关系，减少机会主义和交易成本，促进社会整合发展。正如弗朗西斯·福山所说，信任是组织和社会高效运行的润滑剂^⑩。按照已有研究，信任可以分为：一般信任和特殊信任。前者是一种类似福山所说的普遍道德资源，旨在保证社会互动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后者又可以分为：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具体讨论如下：

1. 居民一般信任分析

一般信任指的是人们对普通社会成员（即使是陌生人）的信任感，是考察社会质量的重要指标。对“您认为大部分人是否值得信任”这一问题的回答中，42.4%认为大部分人值得信任，35.2%认为需要小心防范。其中，“认为大部分人值得信任”的被调查者比例（42.4%），与林卡（2010）等人的调查结果相近（45%），远高于王绍光等在 1998 年的调查结果（30%）^⑪，但比英格哈特的调查结果（50%）要低^⑫。此外，除了收入外，年龄和来源地对社会信任没有显著影响。方差分析表明：在不同收入的群体间，表示大部分人“值得信任”组的月收入均值为 4239.93 元，表示“需要小心防范”组的月收入均值为 3385.11 元。可见，居民的收入越高，其对一般社会成员的信任度也越高。这可能是因为中高收入阶层一般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本和对环境的较强控制感，有能力对互动中的违约行为作出惩戒，保护自身利益。

2. 特殊信任

从信任对象看，特殊信任一般可分为人际信任与制度（机构）信任。根据卢曼的观点，人际信任是建立在熟悉度及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系的基础上，而制度（机构）信任是建立在契约规范、法律法规的基础上^⑬。前者作为社会资本的一种表现形式，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产生并存在于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中；后者主要是对社会生活中各种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的信任，以降低互动风险，增强行为的可预见性和确定性。

（1）居民人际信任分析

首先，我们运用主成分法进行因子分析，提取出 3 个信任因子，分别命名为“熟人信任因子”、“普遍信任因子”和“职业信任因子”。其中，熟人信任是建立在血缘、地缘基础上的信任，包括：家人、朋友和邻居；普遍信任因子是测量被调查者对社会一般人群信任，包括：陌生人、不同信仰者及外国人；职业信任因子是测量居民对各个职业群体的信任，包括：医生、商人、雇主、老师和记者。

其次，研究将信任程度分为“完全信任”（4 分）、“一般信任”（3 分）、“不太信任”（2 分）、“完全不信任”（1 分）四个等级，对同一因子中的变量值加总求均值，并进行方差分析。数据显示：总体上，被访者对熟人持较高信任度，均值为 3.45，其次是职业信任。其中，年龄上，青年组对陌生人和外国人的信任度比其他两组高，均值为 2.24，而对熟人和职业身份的信任度均比中老年人低。收入上，高收入者对熟人和一般人群信任度都比中低收入者高。此外，

表 2 人际信任的方差分析

	熟人信任	普遍信任	职业信任
老年组	3.46	2.10	2.82
中年组	3.50	2.18	2.72
青年组	3.43	2.24	2.63
	F = 3.132 Sig. = 0.044	F = 3.339 Sig. = 0.036	F = 8.013 Sig. = 0.00
低收入	3.38	2.08	2.65
中等收入	3.49	2.27	2.73
高收入	3.52	2.31	2.68
Total	3.45	2.20	2.69
	F = 12.21 Sig. = 0.001	F = 12.94 Sig. = 0.000	F = 2.58 Sig. = 0.076

来源地对人际信任的影响没有显著性（见表 2）。可见，人际信任方面存在明显的代际和阶层差异，青年人更信赖公共关系，中老年人和高收入者更依赖熟人网络。（2）居民制度信任分析

首先，我们运用主成分法进行因子分析，提取出 3 个信任因子，分别命名为“公共部门信任因子”、“营利部门信任因子”和“非营利组织和宗教团体信任因子”。其中，公共部门信任因子是测量居民对公权力部门的信任度，包括：军队、新闻媒体、公安机关、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及立法机关。营利部门信任因子是测量居民对营利组织的信任，包括：大公司、教育科研机构、银行及医疗机构。最后，是非营利组织和宗教团体信任因子。

其次，研究将信任程度分为“完全信任”、“一般信任”、“不太信任”、“完全不信任”四个等级，将同一因子中的变量值加总求均值，然后进行方差分析。数据显示：总体上，被访者对公共部门为一般信任，对营利组织、宗教团体和非政府组织则表现得不信任。其中，年龄上，中老年人对公共部门的信任度比青年高，对非政府组织和宗教慈善团体的信任低于青年人。在收入上，中低收入阶层对公共部门的信任度高于高收入阶层。在来源地上，农村人口对公共部门和商业组织的信任度高于城市人口（见表 3）。可见，在传统官民思想及补缺型福利模式下，老年人、农村人及低收入人群在城市中，社会支持网络比较单薄，更依赖公共部门提供的社会保护，因此对其更为信任。

（三）增进社会凝聚的价值规范

除了信任之外，价值规范也是培育社会凝聚，提升社会质量的关键要素。利他主义、宽容接纳和社会契约能够让社会成员意识到彼此间的责任，并通过集体行动和相互合作来提升整体福利，促进社会发展。

1. 利他主义

利他主义也是一种互惠行为。强互惠理论认为人类行为可以超越“自利”动机，为了公平正义而不惜付出代价，甚至在预期个人成本得不到补偿的情况下依然如此。人类社会之所以能保持稳定、合作与秩序，正是由于互惠行为的存在。

首先，关于“是否愿意贡献出收入的 10% 去支持一项帮助失业者或贫困者的项目”这一问题，调查显示：总体上，被访者互惠意愿比较差，大部分居民持犹豫的态度。其中，老年组的互惠意愿比青年组稍强，有 18.6% 的青年人表示不愿意进行捐助；城市人口强于农村人口，只有

表3 机构或制度信任的方差分析

	公共部门信任	商业组织信任	宗教慈善团体信任
老年组	3.23	2.94	2.41
中年组	3.07	2.88	2.53
青年组	2.89	2.86	2.57
	F = 22.655 Sig. = 0.00	F = 1.334 Sig. = 0.264	F = 4.174 Sig. = 0.016
低收入	3.04	2.89	2.52
中等收入	3.00	2.95	2.62
高收入	2.96	2.85	2.59
	F = 1.177 Sig. = 0.309	F = 2.413 Sig. = 0.09	F = 2.56 Sig. = 0.078
城市	2.98	2.87	2.54
农村	3.07	2.95	2.55
Total	3.01	2.90	2.54
	F = 5.362 Sig. = 0.021	F = 5.417 Sig. = 0.02	F = 3.782 Sig. = 0.052

32.1%的农村人口表示愿意捐助；中高收入组的利他意愿也强于低收入组（见表4）。可见，由于货币递减的边际效用及捐赠所带来的心理满足，中高收入者更倾向于采取互惠行为。而我国传统文化和现代市民精神中所强调的共同责任和集体意识，也会对老年人和城市人的互惠意愿产生影响。

表4 “是否愿意贡献出收入的10%”的卡方分析

	非常乐意	乐意	看情况	不乐意	非常不乐意	总计
老年组	9.6%	21.2%	59.6%	7.5%	2.1%	100%
中年组	5.8%	29.1%	50.5%	10.5%	4.0%	100%
青年组	8.4%	28.6%	44.4%	14.1%	4.5%	100%
		Chi. = 16.917		Sig. = 0.031		
低收入组	8.0%	21.8%	55.2%	11.4%	3.7%	100%
中等收入	10.5%	31.6%	43.8%	9.9%	4.2%	100%
高收入组	10.6%	37.2%	35.3%	13.5%	3.4%	100%
			Chi. = 27.877		Sig. = 0.000	
城市	7.5%	30.6%	45.9%	11.6%	4.4%	100%
农村	9.4%	22.7%	53.6%	11.5%	2.7%	100%
			Chi. = 9.943		Sig. = 0.041	

其次，关于“是否可以为了公众利益而牺牲个人自由和快乐”这个指标，调查表明：大部分居民对此持犹豫的态度。其中，老年人的公共精神强于中青年，42%的老年人认为“为了公众利益可以牺牲个人自由和快乐”，而只有28%的青年人持相同态度；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更富公共精神，表示愿意牺牲个人利益的比例分别为35.6%和25.9%。同时，针对收入的方差分析表明：高收入者比低收入者更有公共精神。可见，公共精神在阶层、城乡及代际之间都存在较明显的差

距。

2. 宽容

与社会网络和社会契约相反，宽容强调对社会异质性的尊重。按照文化适应理论，宽容和接纳一样，都强调本地居民对外来人员的接纳态度。我们用两个指标来测量：（1）社区接纳不同背景的人；（2）对外来人员态度，包括成为政治领导人、企业主管、参加高考、同等社会保障待遇。首先，我们对不同背景人群的接纳度加总，求均值，然后进行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深圳居民总体接纳度较高，其中青年人对不同人群的接纳度最高，而收入和来源地等变量的影响均不显著。其次，对外来人员的态度。同意外来人员成为政治领导人、参加高考、成为企业主管及享受同等社会保障待遇的比例分别为 92.5%、91.1%、95.2% 及 85.9%。综合而言，深圳居民对外来人员的宽容和接纳度较高。

3. 社会契约

社会契约是有关权利和责任的共同约定，有赖于社会成员对权威制度和普世价值的承认与尊崇，并以此维护公平正义和对抗社会分化。作为社会凝聚的价值规范三要素之一，社会契约在培育集体责任和互惠合作，避免“搭便车”行为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文章用以下两个指标来测量社会契约。首先，关于贫困的原因，46.2% 的人认为生活困难是由于自己缺乏能力造成的；而将个人困难归咎于社会制度的也占了 37.3%。卡方分析表明：相对城市人口（41.5%）来说，大部分农村人口（49.5%）认为个人能力是贫困的主因。可见，现阶段能力欠缺依然是造成农村贫困，影响社会凝聚的主要根源。其次，对于“一个人通过努力能否达到更高的社会或经济地位”这一问题，24.6% 的被访者认为“非常可能”，60.6% 的认为“有可能”。其中，中间阶层的态度比高收入阶层和低收入阶层更为积极，认为“非常可能”的收入均值为 4044.04 元，年龄和来源地的影响均不显著。可见，民众对社会流动机制还是比较信任，其中中间阶层对社会流动的预期最积极，低收入阶层对前途较为迷茫。

（四）社会网络

社会网络可分为：水平、垂直和交叉网络。水平网络主要由那些自愿加入的、不期望任何实质收益的非正式组织关系构成。垂直网络是那些带有科层特征的关系网。相对来说，交叉网络一般建立在日常社会互动的基础上，能够最有效地促进集体利益和社会整合，是社会凝聚和社会建设的基础。文章利用组织参与、邻里互助及求助网等变量来测量社会网络。

在组织参与方面，文章运用主成分法提取以下 3 个因子：“公共与职业组织参与因子”、“娱乐活动参与因子”和“宗教活动参与因子”。其中，公共与职业组织参与因子是测量居民对政府和非政府机构及职业组织的参与度，包括：工会、政党、职业协会及非政府机构。娱乐组织参与因子包括对体育娱乐团体及艺术文化团体的参与。文章对同一因子中的变量值加总求均值。总体上，深圳居民的组织参与能力比较一般，对休闲组织的参与最高，均值为 1.67（从未参加 1 分、偶尔参加 2 分、经常参加 3 分）。其中，在公共与职业组织上，高收入阶层参与频率最高，城市人比农村人高，老年人比青年人高，在休闲组织和宗教组织上，参与情况类似（见表 5）。其次，城市社区邻里互助情况也相对较为一般，其均值为 2.58。最后，文章分析了居民遇到困难时的求助对象，结果显示：居民对亲属朋友、同事等非正式社会网络利用程度较高，但对政府部门、非营利组织等正式社会网络利用程度较低。总之，现阶段城市社会资本存量不高，网络封闭性较强，且存在明显的阶层、城乡及代际差异。

表5 居民组织参与的方差分析

	公共与职业组织参与	休闲组织参与	宗教组织参与
老年组	1.43	1.77	1.15
中年组	1.33	1.56	1.14
青年组	1.31	1.70	1.15
	F = 5.505 Sig. = 0.004	F = 8.065 Sig. = 0.000	F = 0.079 Sig. = 0.924
低收入	1.22	1.55	1.13
中等收入	1.38	1.77	1.15
高收入	1.51	1.74	1.16
	F = 35.42 Sig. = 0.00	F = 15.914 Sig. = 0.00	F = 0.567 Sig. = 0.567
城市	1.38	1.72	1.14
农村	1.24	1.59	1.16
Total	1.34	1.67	1.15
	F = 22.127 Sig. = 0.00	F = 11.702 Sig. = 0.001	F = 0.63 Sig. = 0.428

(五) 身份认同

身份认同主要是指对所处社群的心理归属，具体包括：国民身份认同、城市居民身份认同和社区居民身份认同。民众对社群的认同感直接与其社会信任、社会参与及互惠行为相关，只有较高的社会认同才能产生社会信任，进而产生更多社会参与和互惠合作，增强社会凝聚。由于居民对国家、城市的认同度比较高，因此本文重点考察社区认同。卡方分析表明：总体上，城市居民的社区认同感较强，其中，高收入者比中低收入者认同感强，老年人比中青年强，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强（见表6）。可见，与社会资本一样，城市社区认同也存在明显的代际、阶层及城乡差异。

表6 居民社区认同的方差分析

	十分认同	认同	不太认同	非常不认同
老年组	28.6%	62.3%	9.1%	0.0%
中年组	20.9%	62.6%	14.7%	1.8%
青年组	14.5%	57.0%	24.8%	3.7%
	Chi. = 41.506 Sig. = 0.00			
低收入	16.9%	59.5%	21.3%	2.3%
中等收入	15.7%	60.5%	21.9%	1.9%
高收入	30.6%	53.4%	12.1%	3.9%
	Chi. = 27.311 Sig. = 0.00			
城市	23.5%	66.4%	8.7%	1.4%
农村	10.9%	69.2%	17.8%	2.1%
	Chi. = 1.188 Sig. = 0.00			

四、结 论

社会质量是由社会经济安全、社会凝聚、社会融入及社会赋权等构成。社会凝聚又包括信任、价值规范、接纳、社会网络及身份认同等。通过对社会凝聚的分类考察，能够很好地反映现阶段我国城市的社会质量。研究表明：我国城市社会凝聚状况一般，且阶层化特征较为明显，具体而言：

首先，信任分为一般信任和特殊信任（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深圳居民的一般信任处于中等水平。其中，高收入阶层对一般社会成员的信任度比低收入者高。在人际信任方面，居民对熟人的信任度较高，对陌生人的信任度较低。其中，相对低收入阶层来说，中高收入阶层对熟人和一般人群的信任度普遍更高，这可能是由其自身丰富的社会资本，以及对风险的较强承受力和自我保护能力所决定的。在制度信任上，居民对公共部门信任度较高，对营利部门和宗教团体信任度较低。其中，老年人、农村人及低收入人群对公共部门的信任度分别比青年人、城市人及富人高。这可能是由这些弱势人群所处的地位所决定的，他们在城市中，社会支持网络比较单薄，更依赖公共部门提供的社会保护，因此对其更为信任。

其次，增进社会凝聚的价值规范包括利他主义、宽容和社会契约。在利他主义上，城市居民的总体意愿较低。其中，中高收入者更倾向于采取利他行为，这主要由货币递减的边际效用及互惠所带来的心理满足所决定的。同时，由于贫富差距及生活压力的影响，年轻人及低收入阶层的互惠意愿和公共精神明显低于老年人和高收入阶层。现阶段，我国城市中较低的利他主义可能是由城市社会网络的封闭性造成的。在陌生人社会中，居民更愿意与熟人交换和分享利益，难以形成强烈的利他动机，也不利于更广泛意义上的社会凝聚和社会整合。就宽容度来讲，深圳居民对外来人员接纳度较高，其中青年人对不同人群的接纳度最高。在社会契约上，民众对社会流动机制比较信任，其中中间阶层对社会流动的预期最积极，低收入阶层对前途较为迷茫。此外，大部分农村人口认为，能力欠缺仍然是造成农村贫困，影响社会凝聚的主要根源。可见，民众对那些保证社会公平和避免社会分化的制度较为信任，但其中存在的阶层差异也是值得注意的。

最后，社会网络方面，城市居民对亲戚朋友、同事等非正式社会支持网络利用程度较高，但对政府、非营利组织等正式社会网络利用程度较低。同时，在组织参与上，城市居民的参与能力比较一般。其中，中高收入阶层对公共与职业组织的参与度比低收入者高，城市人比农村人高，老年人比青年人高，在休闲组织和宗教组织上，参与情况类似。可见，现阶段城市社会资本存量不高，社会网络结构较为封闭，且存在明显的阶层、城乡及代际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居民对社会的融入，破坏了广泛的社会信任和社会整合，而且这种影响将会随着贫富分化而不断加剧。在身份认同方面，深圳居民对国家公民身份的认可度最高。在社区认同上，高收入者比中低收入者认同感强，老年人比中青年强，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强。可见，与社会资本一样，城市社区认同也存在明显的代际、阶层及城乡差异。

总之，当前我国城市社会质量和社会凝聚呈现出的特点是，社会凝聚水平一般，且阶层差异、城乡差异和代际差异较为明显。在横向上，中高收入阶层和城市人口的社会资本、利他倾向及社区认同明显高于低收入阶层和农村人口。在纵向上，年轻人的社会资本、社会参与、利他倾向及社区认同均低于老年人。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深入，贫富分化加剧，城市社会凝聚问题将会日益凸显。因此，现阶段政府应该努力重塑公信，培育社会资本，促进社会公

平和社会参与，降低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提升社会凝聚和社会质量。

①Beck, W. , Van Der Maesen, L. and Walker, A. ‘Social quality: from issue to concept’, in Beck, W. , Van der Maesen, L. and Walker, A. (Eds.) *The Social Quality of Europe*. The Hague: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1997: 263 – 297.

②Walker, Alan. *Social Quality and Sustainable Welfare*. The 1st Keynote Speech Delivered at The 2nd Asian Conference on Social Quality and Sustainable Welfare Societies, Taipei: Nation Taiwan University, March, 2007: 28 – 29.

③Friedkin E. Noah. Social Cohesion. *Annu. Rev. Sociol.*, 2004, 30: 409 – 25.

④Festinger L, Schachter S, Back KW. *Social Pressures in Informal Groups: A Study of Human Factors in Housing*. New York: Harper, 1950: 11 – 57.

⑤Jenson, J. Mapping Social Cohesion: The State of Canadian Research. *CPRN Study F03*, Ottawa, 2005.

⑥Chan J. ; To H. – P. ; Chan E. Reconsidering Social Cohesion: Developing A Definition and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Empirical Research.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06, 75: 273 – 302.

⑦Canadian Council on Social Development. *Social Cohesion in Canada: Possible Indicators*. Canadian Council on Social Development, for Social Cohesion Network [DB/OL], Department of Canadian Heritage and Department of Justice, Ottawa, www.ccsd.ca/pubs/2001/si/sra-543.pdf, 2000.

⑧Jeanotte, M. Sharon. *Social Cohesion Around the World: 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of Definitions and Issues, Strategic Research and Analysis*. Canadian Heritage, Ottawa, 2000.

⑨Walker, A. (et al) . Indicators of Social Quality of the European Scientific Network.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Quality*, 2003. 5 (1&2) : 19.

⑩弗朗西斯·福山 《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年，第25~113页。

⑪王绍光、刘欣 《信任的基础：一种理性的解释》，北京《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3期，第23~39页。

⑫林卡、柳晓青、茅慧 《社会信任和社会质量：浙江社会质量调查的数据分析与评估》，南京《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第61~67页。

⑬岳璠、田海平 《信任研究的学术理路——对信任研究的若干路径的考查》，南京：南京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第19~24页。

作者简介：武艳华，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社会学系博士生；黄云凌，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公共管理系博士生；徐延辉，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福建厦门 361005

[责任编辑 左晓斯]